

集邮

邮票艺术中的 内蒙古民族歌舞

□刘建禄

邮票被誉为“国家名片”“袖珍艺术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发行的邮票中,留下了内蒙古民族歌舞的丰富印记,展示了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时代风貌。这些邮票飞入千家万户,飘向五洲四海,向全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呈现了内蒙古民族歌舞的独特魅力,也传递着内蒙古欣欣向荣、发展进步的丰富讯息。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中国邮政共发行5组纪念邮票,其中第4组“举国欢庆”1套3枚。第1枚以雄伟壮丽的天安门为背景,描绘了汉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苗族等民族身穿节日盛装,在天安门广场欢歌曼舞的场面,形象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热烈气氛,生动体现了中华各民族的大团结。这也是蒙古族歌舞形象第一次进入新中国邮票。

1963年6月15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民间舞蹈(第2组)》特种邮票1套6枚,其中第3枚是“鄂伦春族鄂伦春舞”。图案中,一对男女演员身着民族服装,正在表演打猎时的骑马动作。历史上的鄂伦春族,是在大兴安岭地区以狩猎为主,辅以采集、捕鱼的少数民族,鄂伦春歌舞源于独特的生产生活实践,打猎舞表现了骑马持枪狩猎场面,熊斗舞模拟狗熊姿态,“红普嫩”反映了妇女的采集活动。广泛流行的“鄂呼兰,德呼兰”“依哈嫩”,是围着篝火饱食猎物后的自娱性歌舞。鄂伦春族主要聚居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县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

1973年6月1日,中国邮政发行《儿童歌舞》特种邮票1套5枚,其中第2枚是“拉马头琴(蒙古族)”。图案采用民间剪纸艺术,刻画了一个站立演奏马头琴的蒙古族男童形象,十分清新可爱,也反映了蒙古族少年儿童在祖国大家庭中健康快乐成长。马头琴是蒙古族传统拉弦乐器,因琴柄顶部镶有马头而得名,蒙古语称“潮尔”。马头琴曲目风格多样,富于草原特色,曲调委婉,多是描绘自然风光或者对马的歌唱。著名曲目有“万马奔腾”“欢乐的草原”“牧马人之歌”等。

1999年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中国邮政发行“民族团结”纪念邮票1套56枚,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乃至世界邮票发行史上一次发行枚数最多的一套邮票。邮票图案以“盛装歌舞为主、兼顾民俗”,反映了全国56个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共同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和欢乐祥和、庆祝国庆的场景。

这套邮票的第31枚是“达斡尔族”。图案中,身着民族服装的一对青年男女,欢快地表演达斡尔族传统舞蹈“鲁日格勒舞”。该舞蹈取材于现实生活,模拟各种动物的动作,伴以鸟兽的鸣叫,并艺术再现畜牧、狩猎、捕鱼、农耕等生产劳动的情景。达斡尔族主要聚居在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和其他旗(市)的达斡尔民族乡。

2007年5月1日,中国邮政发行《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纪念邮票1套2枚,分别是“吉庆”“欢歌”。“欢歌”图案是身着蒙古族盛装的女青年,在一望无际的碧绿草原上载歌载舞,表现了欢乐喜庆的节日气氛,也展现了草原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和日益美好的幸福生活。

2017年5月1日,中国邮政发行《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纪念邮票1套3枚,分别是“守望相助”“亮丽北疆”“民族和谐”,生动展示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守望相助,建设亮丽内蒙古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民族团结、边疆稳固的良好局面。其中第3枚“民族和谐”图案,以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5月1日宣告成立时的乌兰浩特“五一会址”和绚丽多彩的礼花为背景,描绘了各族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的庆祝场景。

2019年10月1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邮票1套5枚,依次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文化繁荣兴盛”“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建设美丽中国”。同时发行小型张1枚,主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标志,背景衬以鲜艳牡丹花和扬起的帆船图案,下方是一艘远洋巨轮。底图为包括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在内的全国56个民族,载歌载舞,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整个画面寓意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各族人民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中华民族这首巨轮,将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新的起点,朝着“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乘风破浪万里浪,凌云青扬千帆帆。

多宝阁



清代葡萄松鼠葫芦瓶

□朱卫东

这是一只葡萄松鼠斗彩葫芦瓶(如图),上面描绘的是一幅松鼠嬉闹玩葡萄的画面。这只葫芦瓶高约14厘米,小口,短颈,造型端庄秀美,线条婀娜流畅。一枝藤蔓自瓶口蜿蜒而下,纵贯整只瓶腹。葡萄叶片稀疏零落,几串葡萄仿若一座座七彩宝塔倒挂在藤蔓上,亮似珍珠,艳如玛瑙。瓶身的另一面,一只蓝紫色的小松鼠坐在葡萄藤下,2只前肢紧紧抓着草丛中掉落的葡萄,嘴巴一张一合,飞快地进食。瓶底有“大清雍正年制”3行6字双圈楷书款印,青花书写,笔力老到。整件器物造型规整,线条优美、釉色匀净,色彩灿烂,无疑是一件难得的精品。

斗彩,又名逗彩,出现于明成化时期,是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的一种装饰品种。雍正瓷器继承了明成化斗彩清秀飘逸的风格,又开创性地将粉彩与釉下青花结合在一起,使斗彩变得更加秀丽诱人。

葫芦瓶,古瓷器型之一,形似葫芦而得名。葫芦,谐音“福禄”,形体又近似“吉”字,别名“大吉瓶”,寓意大吉大利。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葫芦瓶大量烧造,器型多变,纹饰艳丽繁多。这件葫芦瓶上却没有辅以常见的团花、卷草、祥云、如意等纹饰点缀,留下了大片空白,更显釉质莹润如脂,美不胜收。



清代龙纹火镰

□王继军

这件清代火镰(如图)形状像一只钱包,高6厘米,宽7厘米,由两部分组成,上部为牛皮弯折成一小巧的夹袋,下部为一块锻打钢条,如一把弯弯的镰刀。两者之间以一带纹饰的铜条连接,辅以3颗铜铆钉加固。最引人注目的是牛皮夹袋中央及两侧,均镶嵌有铜质配饰,图案为腾越的飞龙,历经手握摩擦,光亮可鉴。火镰顶端配有两小环及挂钩,一根牛皮挂绳串联其上,颇为实用。整件火镰包浆自然熟旧,钢条外表虽有少许锈迹,但稍加打磨便熠熠闪光。

和现在便捷的打火机相比,火镰算是一种比较久远的取火器物。顾名思义,其名称即因打造成酷似弯镰刀状的钢条与火石撞击能产生火星而得名。用火镰取火,必须有其他两物相辅助:火石与火绒。火石以质地坚硬、高速撞击时能产生火花者为佳。而火绒,俗称火引子,便是艾蒿嫩叶晒干而成,也有用玉米秆芯或香蒲绒的,以易作火为原则。火石与火绒可置于火镰的牛皮内袋中,携带方便,也可防潮。

清末民初,烟草传入中国后,火镰成为重要的生活用具。而对一些世族贵胄、富商大贾而言,能随身携带的火镰,逐渐成了彰显身份与富贵的象征。他们在火镰的钢条上雕饰出各种吉祥图案,在持把上装上金银,或将贵重的宝石如玛瑙、红珊瑚、绿松石之类镶嵌其上,更有甚者,连火镰的绳带也用银子打造连缀而成,可谓环佩叮当,极尽奢华之气。

收藏圈

究竟有多少版《兰亭序》?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3月3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1位军政官员,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每人作诗一首,王羲之为他们的诗文写了序文。序文手稿被后人称为《兰亭序》。文中记叙了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了作者对于生死无常的感慨。《兰亭序》被称为3大行书之首,王羲之的当年47岁,是他的巅峰之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可惜原本已经失传。

据史书记载,在唐太宗遗诏中,明确要求将王羲之真迹《兰亭序》陪葬。民间也有《兰亭序》随武则天陪葬一说。真迹到底落在哪儿,至今还是一个谜。

后人看到的《兰亭序》均为历代的摹本、临本以及刻本。现世比较有名的《兰亭序》版本,有以下几个:

开皇本。“开皇”为隋文帝年号,一种刻本为“开皇十三年”,另一种为“开皇十八年”。此刻本字迹臃肿,因未见于宋人著录,后人疑是伪造。

神龙本。因帖前后印有“神龙”(唐中宗李显年号)各半印得名。后人以此帖翻刻较多,故成一大体系。后经元代郭天锡以至清代翁方纲鉴定为唐冯承素摹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此帖于乾隆年间被刻于“兰亭八柱”,列为第3柱。此帖为初唐墨迹,历来很受推崇,尤其近年来经比较鉴定,多认为它是最接近真迹的,因此,身

价尤高,学此本者众多。

虞世南临本。传为初唐虞世南所临墨迹。元文宗时张金界奴将其上贡,后被皇帝钤以“天历之宝”印,故又名“天历本”。帖后还有宋高宗“绍兴”年号印,于乾隆年间被刻于“兰亭八柱”列为第1柱。人常慕其“第一柱”之名而学之。

褚遂良临本。传为初唐褚遂良所临墨迹(列为“兰亭八柱”第2柱),至明代被陈敬宗鉴定为“褚临本”。因有的字笔法形态似宋代米元章,故又称“米临本”。

定武本。为石刻本。传为初唐欧阳询临本,据载从五代石晋开始流传(当时不作“定武”之称),契丹耶律德光从中原得此,携于真定。耶律德光死后,此石被弃山中,宋太宗赵光义年间被一位“李学究”所得。“李学究”死后,其子为还债取出,被定武太守宋景文收入公库,因此得名。宋代熙宁年间,定武太守薛师正之子薛绍彭将原石损去“湍、流、带、右、天”5字以区别于翻刻本。宋代大观年间,原石被收入宣和殿。“定武本”于宋代最流行,翻刻最多。

玉枕本。传为欧阳询临蝇头小楷,刻于禁中,可能是“定武本”的前身,又名“袖珍本”。又有贾秋壑以“定武本”缩写成者。

颍上本。《思古斋黄庭兰亭》中见,传为“褚本”中最佳者,出于安徽颍上井中,又名

“颍本”。原缺数字,后有翻补,甚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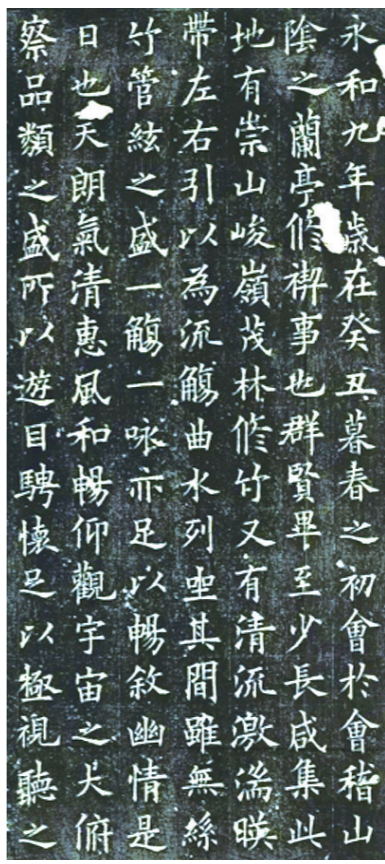
黄绢本。亦称“洛阳官本”,帖中“领”上加了“山”,世称“领字从山本”,传为“褚本”(明王世贞藏)。也有说“黄绢本”与“领字从山本”不同,但同出于一个祖本或宋人“游似本”。

陈鉴本。明代陈缙熙所收,并在前加一伪本。传为“褚本”,陈缙熙好钩摹,多以此刻石。曾失15年后复得,故多刻之,共有好事者。

“定武”体系中其他本。如“国学本”“何氏东阳本”等属“定武”体系。“国学本”于明初由徐达从“天师庵”送至国子监,又称“天师庵本”,比东阳何士英藏本为优。另有“荣莒本”,五字未损,仅逊“落水本”。

《兰亭八柱帖》。杂帖。清代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以《兰亭序》临摹本墨迹3种上石,共分8柱:第1柱为虞临本(张金界奴本),第2柱为褚临本,第3柱为冯摹本即神龙本。另外3柱为柳公权《兰亭诗》3种,还有明代董其昌临柳书《兰亭诗》和乾隆临董其昌本《兰亭诗》共8卷刻于8柱之上,摹勒极为精美,传本不多。“八柱”现在北京中山公园,已损。

其他。此外据传还有“洛阳本”“赐潘贵妃本”“薛稷本”“游似本”“上党本”“米氏本”“薛绍彭本”等等。历代相传的不同本子不下百余种。(人民)



欧阳询楷书《兰亭序》局部。